

农业伦理学的新起点和前沿动态 ——首届“农业伦理学与生态文明研讨会”综述

李建军 赵冰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083)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6)05-0133-07

2016年7月22~23日,由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农业伦理学研究会(筹)主办,中国科学史学会农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农业大学农业伦理学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兰州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石台秋浦慢生活庄园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协办的首届“农业伦理学与生态文明研讨会”在安徽省石台县慢生活庄园顺利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兰州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全国著名高等院校的30多位研究者和国际友人参加了本次学术研讨活动。

本次会议安排有主题发言、专题讨论和茶业文化遗产考察体验等,涉及议题包括农业伦理学与现代农业、农业文明史和文化遗产、农业的多功能性与生态文明等。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草地农业科学院任继周为本次研讨会发来贺信。兰州草地农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雷晓云女士、安徽石台县主管农业的副县长杨普先生和安徽天方茶业集团的董事长郑孝和先生莅临会场并发表致辞。研讨会得到安徽天方茶业集团慷慨资助和大力支持。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王思明教授主持了研讨会的开幕式。雷晓云副书记首先代表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宣读任继周院士的贺信。任院士在贺信中指出,“中国是以农立国的文明古国。中国有着丰富多彩的自然生态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农业成就。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农业伦理知识。正是这些农业伦理的智慧引导中华民族创造了悠久而光荣的历史……近三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高速发展,走过了相当世界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300年历程。当我们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回顾来路,令人惊讶地发现,我们走得过于匆忙,几乎遗失了农业伦理这一重要维度。当医学伦理学和工业伦理学等学科都已在大学里阔步前进的时候,我们却没有一所农业大学开设农业伦理学课程。原来我们行走在农业伦理的盲区,令人不寒而栗。这个失误使得我们的水土资源和生物资源蒙受巨大损失,我们的生存环境面临威胁。我们主要农产品的生产成本远高于舶来品的到岸价。于是发生了举国为之忧虑的‘三农问题’,对此曾经有过多种解读和对策,却很少触及农业伦理学这个最根本的原因”。他说,本次研讨会的召开“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我衷心盼望这次会议在科学交流的同时,构建我国农业伦理学委员会框架,团结我国农业伦理学科学工作者,同心协力,焕发农业伦理学的智慧之光,使我国农业发展远离盲目和曲折,增加一些伦理认知,踏踏实实地走向农业现代化。”

杨普副县长在致辞中介绍了石台县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以及茶业发展的悠久历史,他说,石台县的产业创新和乡村发展亟需要转变观念和智力支持,感谢来自全国各地专家在百忙

【收稿日期】2016-07-30

【作者简介】李建军(1964—),男,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农业伦理学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伦理学与公共政策,科学技术、创新管理与农村发展等。

之中汇聚石台慢庄,共同探讨事关中国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希望与会专家为石台县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宝贵意见和建议。预祝大会圆满成功。董事长郑孝和董事长在致辞中热情欢迎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并简要分享了天方集团在打造茶业产业链、创办慢生活庄园和引领村民脱贫致富的创新实践和深刻感悟,强调人文情怀和伦理思考在茶业拓展和乡村发展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他真诚地感谢各位专家学者来天方集团进行学术研讨,期望会议研讨能为天方集团乃至全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李建军教授在致辞中说,农业伦理学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需要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共同努力才可能有所推进。本次研讨会的顺利举办,得益于前期的系列筹备工作和偶然的“机缘”。2009年,我们和荷兰乌德勒支大学合作在中国农业大学举办了首届“中-荷生命伦理学会议:涉及实验动物的伦理学问题和公共政策”。2014年秋,在任继周院士的倡导和推动下,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率先在全国高校开设“农业伦理学”系列讲座,逐渐汇聚国内专家学者和研究资源,以创建农业伦理学的新学科。2016年3月12日,天方茶业集团董事长郑孝和先生在北京参加“两会”期间,受蒋劲松教授的特意邀请在清华大学“动物伦理学与护生文化系列讲座”上做题为“人大代表郑孝和的动物情怀和思考”的报告,我非常荣幸地接受邀请做本次报告的评论者。在报告中,郑先生通过诸多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生动故事阐述了保护动物与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道德相关性,并呼吁公众和农业生产者加强伦理修养,谨防对消费者健康、动物生命和自然生态造成严重危害的“互害社会”的出现。郑先生的报告与我们之前在学术圈内讨论的诸多观点产生强烈共鸣,我在评论和互动环节中提到我们在任院士支持下正在进行的农业伦理学研究计划,并提议他资助我们组织一次研讨会。郑先生当即慷慨允诺,同意资助我们在安徽石台举行首届农业研讨会。我衷心感谢郑先生对中国农业伦理学研究事业无私奉献和大力支持。

一、大会主题报告

李建军教授主持了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报告会和《农业伦理学与现代农业》专题讨论会。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刘大椿先生首先做了题为《从生态文明的视角看人工自然》的主题报告,讨论了构建农业伦理学和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和基本立场。他说,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关键在于天然自然与人工自然的协调发展。长期以来,人们把自然视为“取之不尽”的原料库和“容量无限”的消化器,盲目地索取天然资源,又把大量的废物和垃圾投向天然自然,从而导致人类及其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的对立。对人与自然关系短期的、局部的、狭隘的理解,把个人利益、当前利益和局部利益放置在人类整体利益之上的文化观,是构成人工自然危机的文化根源。他认为,要摆脱当前人类发展面临的困境,必须实行一种深刻的文化战略转变,具体包括把握人工自然发展的自然限度、主动高扬人类的主体创造力和反思精神,以及构建人工自然发展的全球范畴等等,其中的关键在于抓住自然发展是人类发展的前提,认识到自然的内在价值和基本权利。他强调说,在根本意义上,侵犯自然是侵犯人类的共同权利,也即侵犯人类的基本权利。比较而言,侵犯人权容易中止与弥补,即使无法弥补,历史更新时限也短。而侵犯自然的后果却很难消除,可能造成历史性灾难。

王思明教授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什么与如何保护》的主题报告中分析说,联合国粮农组织关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提出的是一个项目遴选的概念,强调农业文化遗产在农业生产系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价值,具有可操作性,但这并不代表它就是农业文化遗产的全部内涵。借鉴中国农业文明史研究先驱者的理论贡献和国际社会对文化遗产的多种理解,他认为,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同历史时期人类农事活动发明创造、积累传承

的,具有历史、科学及人文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综合体系。完整的农业文化遗传应该是一个“五位一体”的复合系统,既包括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民)、农业生产的对象(土地)、农业生产的方式方法(技术)、农业生产的组织管理(政策和制度)以及农业生态生产所依托的生态环境。具体说来,农业文化遗产可细分为 10 大类:即包括有形物质遗产(具体实物),也包括无形非物质文化遗产(技术方法),还包括农业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相融合的形态,如农业物种、农业遗址、农业技术方法、农业工具与器械、农业工程、农业聚落、农业景观、农业特产、农业文献、农业制度与民俗。关于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他强调应注意八大关系,即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关系、农业遗产保护与农民利益的关系、生产生态功能与文化功能的关系、保护主体与多方协调的关系、理论研究与实践推进的关系、现实保护与记忆留存的关系、政策导向与制度建设的关系、保护主体与社会大众的关系。他说,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并非要阻止人类现代化进程或用传统农业取代现代农业,而是希望继承传统农业所蕴含的生态智慧和伦理思想,确立农业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新航向;农业遗产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是农民,保护主体是农民,遗产保护必须尊重农民选择、鼓励农民参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不损害农民利益;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和魅力在于其千百年来孕育的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和文化功能的统一。保护多元农业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我们文化的根脉及未来文化创新的重要资源。希望农业伦理学研究者、农业文明史专家和其他社会同仁一起,共同努力,认真研究和发掘农业文化遗产的宝藏,为守护人类的精神家园和推进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多做贡献。

来自波兰华沙大学生命伦理学和法学中心的帕瓦特·武科夫(Pawel Lukow)在题为《多功能农业的伦理学——一种参与式方法》(The ethics of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a participatory approach)的主题报告中说,过去一个多世纪,将乡村活动几乎完全限定为农业生产的观念主导了整个西方社会:农村被看作是“食品和纤维工厂”,乡村生活被简化为农业活动,农业目标几乎完全指向可商品化的物品。然而,在多功能农业的概念出现在欧盟政策表述之时,以上观念发生了急剧变化。“多功能农业”出现在高补贴农业经济体如欧洲之中,意在论证补贴政策的合法性。欧共体委员会在 1988 年发布的报告“乡村社会的未来(The future of rural society)”中指出,农业部门可对辖区内的经济发展、环境管理和乡村社会的发展做出多重贡献。1992 年“地球峰会”通过的《21 世纪议程(Agenda 21)》第 14 条强调,农业政策必须考虑农业的多功能性。1993 年,欧洲农业法理事会推荐将多功能农业作为欧洲农业法律体系协调的工具和可持续农业发展的合法性基础。随后,欧洲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正式采纳农业多功能性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农业政策的集成性特征,其中必须包括农业的转型和发展、经济多样化……自然资源管理、环境功能的增强和文化、旅游和休闲的推广等丰富内涵。他分析说,农业的多功能性是“通过农场活动而创造的所有物品、产品和服务”。农业活动不限于食品和纤维的生产,也提供各种具有非商业特征的产出,如文化的、社会的和保护(存)性的利益。有关农业多功能性的经济学方法通常将农业生产视为农业和农村发展公共决策或个体行动的重点,倾向于忽略或低估农业多功能性所包含的核心伦理和文化价值。受这种经济学方法的影响,农业经济快速发展或产量显著增加多数情况下会以自然景观和乡村文化的严重破坏为代价。他认为,农业可持续发展亟需一种整体性方法作为设置发展优先性和公共决策的适当框架,以权衡各种不同的优先项,如伦理的、文化的、美学的和经济的等,但其在哲学和政策层面面对的挑战主要是:谁将参与相关的决策过程和决策应该如何进行,这两者都是规范性问题且涉及伦理对话的本质,因而需要引入参与式的方法以解决公共决策和个体行动中可能存在的价值冲突。

二、农业伦理学和现代农业

在“农业伦理学和现代农业”专题讨论中,清华大学的卢风教授首先做了《生态伦理与农业伦理》的发言,他说,大量使用化肥、农业的大农业是不可持续的,现代工业文明把文明与自然之间的冲突空前地凸显出来。建设生态文明不可不发展生态农业,发展生态农业不可没有农业伦理。在他看来,任继周院士以时、地、度、法四维构建的农业伦理系统属于宏观农业伦理,其核心思想可概括为:敬畏自然、与时俱行、服从天命、遏制贪欲、取予有度。这些观念与生态哲学完全一致。任院士的农业伦理是返本开新的努力:以现代科学(特别是复杂性科学)去诠释中国传统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与时俱行、取用有度的生命智慧。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的陈春文教授在发言中说,任继周院士是中国农业伦理学发展的思想坐标,其在几十年的草业科学研究和实践中提炼的草粮农业耦合共存的大农业战略与中国农业伦理学体系,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多个层面进行阐述和探讨。南京农业大学的严火其教授在题为《人类何以关心动物福利》的发言中说,人类关心动物福利的理由很多,大致包括对食品安全的现实需要、保障科学研究质量和伦理观点的变化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郭洪水教授讨论了“农村生活世界的瓦解和重构”,他说,农业伦理学的基本尺度首先是大地伦理,发现大地和荒野作为意义涌现的丰盈性。其次是生命伦理,绽露存在的真理。最后是生态伦理,让丰富的生活体验和审美经验实现长距离和代际的传承。农业伦理学不再是多数人的功利主义选择,不再是德性论的绝对命令,而恰恰是这样的选择和命令的前提和重新定义的基础。农业伦理学旨在构建一种绿色的“可能生活”,它是慢节奏、低风险的,以让此在的生命之河不断流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齐文涛博士在发言中认为,“守候与照料”是农业伦理的基本原则,理由是“守候”规定了人之有所作为的前提,“照料”规定了人之有所作为的限度。以此为引导,可构建有人参与的可持续、无污染的农作生态系统。他说,“守候与照料”并非无源之水,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种植业主张“顺天时,量地利”、养殖业强调“必怀爱重之心”且重视放牧散养,均体现了“守候与照料”的伦理精神。他指出,基于“照料和守候”的原则,可提出评价农作活动伦理正当性的两种方法,即理念分析法和三维分析法。前者考察农作活动是否“敬畏自然”、“顺应自然”和“仅取盈余”,后者考察农作活动是否维护生态平衡,有益系统生态和生命健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樊志民教授对此评述说,“守候和照料”作为一种伦理原则需要进一步界定和细化,这种伦理观具有某种程度的保守性,可能难以对现代农业实践发挥规范和引导作用。他认为,任继周院士积数十年之大成构造的以“时”、“地”、“度”和“法”为伦理四维的农业伦理体系,是一种客观论或本体论意义上的农业伦理学。如果从主体论或能动性意义上去挖掘,我们还可以构建一种以“敬”、“和”、“因”、“为”为伦理四维的农业伦理学体系。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建军教授在讨论中指出,任继周院士和樊志民教授所提出的中国农业伦理学体系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对中国传统农业发展智慧高度凝练的思维成果,明显带有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实用理性的特征。其中包含的伦理规范不仅对于我们破解当代农业发展的难题有规范价值,而且可能对人类社会应当气候变化等大尺度生态问题有启发作用。如果我们能集中精力和资源对这些中国特色农业伦理学体系中所包含的微言大义进行深入阐发,并尽可能地在世界论坛上去传播和表述,我们完全可能以我们独特的伦理智慧和生态思想对世界农业和文明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近年来,西方应用伦理学,包括农业伦理学开始出现从传统的道义论和权利论意义上的伦理学向强调德性和公共善意义上的伦理学转向,比如注重对“可持续性”、“团结”等伦理规范的讨论,意在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做出建设性回应。基于中国传统农业文化资源的农业伦理学思想在这一发展向度上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和理论自信,应当作为我们构建中国农业伦理学体系的重要方向。

清华大学蒋劲松教授在题为《虫害控制策略的动物伦理学》的发言中指出,现代农业不仅应增加农作物产量,提升产品品质,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改进生态,还应减少对动物的伤害,前瞻性地适应动物保护运动带来的巨大变化。他说,农作物应对虫害控制的策略,无论是采用农药、杀虫剂还是抗虫转基因技术,都是基于人类与昆虫互相对抗的战争模型。人类在这种彼此对抗的战争中很难一劳永逸地获胜,而且技术与昆虫演化之间无止境的军备竞赛最终会导致一系列环境问题。为此,他从动物伦理学的角度追问,农作物虫害控制的模式是否可调整为人类与昆虫耦合共享农作物生态系统的模式?这要求人们不再将可能食用作物或粮食的昆虫看成敌人,而是当作与共同生活的同伴、邻居和亲人,看成审美对象或必须道德关怀的对象。如此一来,虫害控制就变成了人类与昆虫协商对话的过程,共荣共活就成为虫害控制的目标。他说,昆虫本身不是灾害,只有生态系统失衡导致昆虫数量剧增,进而对农作物生长构成严重威胁时才是灾害。这种灾害不仅是人类的灾难,也是过度繁殖的昆虫的灾难,是整个生态系统的灾难。对这种过度繁殖的限制既是对人类利益的保护,也是对昆虫利益和整个生态系统的保护,其伦理正当性应该能得到动物伦理学的辩护。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肖显静教授在题为《科学之于环境:从‘规训’走向‘顺应’》的发言中,以贵州省黎平县双江乡黄岗村的“糯改粳”、“粳改杂”的例子讨论了实验室科学应用于地方农业实践方面存在的局限性。他主张农业科学应该因地制宜,立足于地区生态,通过构建地方性的自然科学化解科学和环境、生产和生态之间的矛盾。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的方锡良副教授在发言中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在粮食增产丰收与安全保障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由于“农药、化肥、杀虫剂、生长素、调节剂、农膜”的大规模和长期使用,造成了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和食品质量风险,对土壤、水体和人体健康等带来巨大的潜在的危害,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迫切需要农业伦理学提供决策支持。他认为,传统农业文化遗产,如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甘肃迭部扎尕那农牧复合系统等生态共生系统中所蕴含的生态智慧和伦理思想,可为中国农业伦理学思想体系的构建提供重要的文化基础和精神资源。

农业伦理学是一个涉及农业科学、生态学、历史学和伦理学等多学科研究领域,其所具有的综合性和现实性特征,以及强调社会—自然生态系统耦合的思想有助于理性地反思和回应“农业应该往何处”等重大战略和公共政策问题。中国农业大学刘巍教授发言说,要以马克思主义农业伦理观为基础,继承中国传统的农业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开展当代农业伦理学研究,充分发挥农业伦理学在当代中国发展中的社会功能和导向作用。海南师范大学杨英姿教授在讨论现代农业所带来环境问题的基础上说,旨在将农业从资本和工业的绑架中解放出来的生态农业具有双重的伦理蕴涵。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生态农业强调农业生产必须注重农业用地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强调人对自然生态的责任和义务;从人与人的关系讲,生态农业增进了消费者和小农户之间的密切联系,内化了当地人对子孙后代的社会责任,维护了代际公正。南京农业大学姜萍副教授在发言中重点讨论了集约化农业引发的伦理问题,她说,集约化农业因其高产出、高效率而成为各国农业争相发展的目标,但其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值得关注的伦理问题,如环境污染、小农户的权利、动物福利等问题。现代农业的发展必须确立协同治理的意识,重视伦理问题的化解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的吴昊在发言中阐述了《齐民要术》中的农业伦理思想,主张农业伦理学的研究必须重视研读传统农书和经典,以提炼和发掘其中的生态智慧和文明思想。中国农业大学吕文林副教授、尹北直博士在发言中分别讨论了“马克思的土地伦理思想”和“中国传统园篱文化中的伦理价值”,尹博士说,中国传统园篱的植物造景手法和经济、生态功能传承至今,其所承载的伦理之美是中国非物质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所集中体现的生产、生活、游憩为一体的“诗意栖居”理想,可为传统农业伦理学的研究提供重要启示。

三、农业文明史与文化遗产

中国人民大学王鸿生教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樊志民教授主持了“农业文明史与文化遗产”专题的研讨会。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的惠富平教授在发言中说,农业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也是影响生态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人类对农业自然资源利用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由此造成的生态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参照农业文明进化的丰富历史,农业伦理学应该首先重视农业生产实践活动积淀下来的生态智慧,讨论人与自然的多重关系,确立人对自然的道德立场。其次应该关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人类生存状态,以负责任的伦理态度处理好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业生态的关系。最后,在出现人的利益和其他生物利益相互冲突的情境下,应该首先关注人的利益,当然也应该考虑农业生产的长期影响,关注子孙后代的利益。王鸿生教授在题为《农业文明视野里的中国人和土地》的发言中说,受“以农耕为本”和“以农立国”等重农文化的影响,中国农业文化总体上呈现出“安土静定”的特征,中国人因此也多具有“安土重迁”的乡土情怀。在多数情况下,中国人依赖土地解决其生活和生产问题,过着简单而和谐的生活。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解决人口增长的压力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农业拓荒垦殖和移民,如明代除向战乱之后人口骤减的中原农耕区大规模移民外,还向北部边疆地区进行屯田移民。在灾荒之年,为了活命养家不得不离开家乡逃荒要饭,因为人们赖以生计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暂时无法提供必需的生存和生活的基本条件。当然,也有因战乱或社会动乱而迫使中国人别离故土,远走他乡的艰难时期。这些独特的生命体验使中国人的农业伦理观烙上了深深的眷恋土地且照料土地的道德情怀。南京农业大学卢勇副教授在发言中讨论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和日本、韩国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成功经验。他说,各国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方面的通行经验是,在注重特殊农产品保护与开发的同时,加强对作为其基础的传统的农耕技术、农耕习俗的传承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日本佐渡岛利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金字品牌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开发出各类特色农产品,如能登海盐、朱鹮大米等,既培养了居民的文化认同感,也切实增加了农民收益;韩国政府和国民对农业文化遗产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虔诚,并采取多种措施和手段来予以保护和开发。每个到访韩国的人都会对韩国泡菜、高丽参系列产品、韩牛产品和地域特色浓郁的韩式歌舞印象深刻,从而大买其产品。与之相比较,我国在传统农耕技术、农业习俗、乡村景观和传统文化等的挖掘和开发的系统性、复合性不足,亟需要包括农史专家、农业伦理学研究者 and 多学科领域的专家协同合作。南京农业大学的李昕升博士、丁晓蕾博士分别在发言中对江苏稻田养鱼的历史及其生物多样性问题、江南稻作农具民俗遗产的文化表现及意义进行了讨论。丁晓蕾博士说,江南稻作农具的民俗文化内容丰富,层次分明,从农具使用过程中的各种实用行为习俗表现,到对农具的爱惜、敬畏,甚至视其为沟通天地人神的象征,这些都是农耕文明长期积淀的成果,具有不可替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博士生崔树芝在发言中讨论了《中国农业文明两种类型的常态、危机及变革》,认为相关研究可对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有启发意义。

四、农业的多功能性与生态文明

卢风教授主持了“农业的多功能性与生态文明”专题讨论会。南京师范大学曹孟勤教授在发言中对中国生态乡村建设中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说,现代化进程伴随着城市的崛起和乡村的衰落,但城

市化带来的严重的城市病让西方社会出现了逆城市化的潮流。生态乡村建设不仅仅是乡村自然环境的改善,更重要的是乡民道德观念的转变和精神生活的丰富。乡村发展的优势在生态,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应该以生态友好的方式推进,让金山银山和青山绿水共存。中国人民大学林坚博士在发言中指出,绿色发展是可持续的、着眼于长期的、有利于代际公平的发展,是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也是通往人与自然和谐境界的必由之路。绿色发展需要全新的道德观念引领和生活方式转型。农业伦理学是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的理论工具和行动指南。河海大学程广丽教授在发言中对福斯特的生态正义理论进行了评述,她认为,福斯特有关生态正义的理论构建对于我们当前思考全球性生态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启发作用,当然也对我们讨论农业伦理学的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的孙涛博士重点表述了他对农业多功能性的理解,山东教育出版社的陈沐博士以中国传统农事诗和农书为依据讨论了农业美学对饮食观念的潜在影响,她说,农业活动的自然景观如农作物本身、农田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以及周边的自然环境,以及人文景观如农人的耕作、休闲、交往等乡村生活场景等,蕴含着农人对美的感知、劳作的充实与艰辛、乡野生活的趣味、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依存的情感等,是人性的自然表达。然而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将食物生产种植过程与消费过程相隔离,让这些人伦之乐被逐渐屏蔽和遗忘。农业美学视角下的农业生产活动对于人类的饮食诉求,并非仅仅只是补充体能及满足口腹之欲,而是通过扩展审美范围来丰富人性、理解人类农业文化遗产的精神价值,探寻更有意义的农业文明之路。湖州师范学院的陆群峰博士讲述了他对转基因作物的非自然性的理解。此外,中国科学院战略咨询院的刘海波研究员、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的 Franck 博士为本次研讨会分析提交了题为《农业、慢创新和创新驱动发展》、《欧洲农业和食品伦理研究会及欧洲对食品和农业的观点》的发言 PPT。北京林业大学的杨志华博士、重庆旅游职业学院的卓丽娜和史玉丁等分别提交了题为《小约翰·柯布生命解放视野下的土地观念》、《云南茶文化生态旅游模式》和《武陵山区旅游产业发展研究》的会议交流论文。

天方茶业集团董事长郑孝和先生和兰州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的雷晓云女士在研讨会闭幕式上分别致辞。郑孝和先生在致辞中说,本次研讨会让我认识到农业伦理学对食品安全治理和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性。首先,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治理侧重于末端治理,将更多的资源投放在市场端的监管和控制方面。我认为,食品安全治理的关键点应该前移至田间地头和食品加工环节,重点应该加强对农业生产源头的环境治理和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农业伦理学教育,让农民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意识到自己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其次,我们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遭遇的最大问题是市场信任问题。为化解这一问题,天方集团探索了会员认领茶山等促使消费者参与生产经营环节的创新机制,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效果。市场信任涉及到经营者的诚信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和食品安全治理才可能真正实现。李建军教授主持了研讨会闭幕式。他说,本次研究会在郑总和各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下成功举办,达到了聚集人气、活跃思想和承前启后的会议目标,将成为中国农业伦理学事业发展的重要事件。在本次研讨会上,大家交流了各种对农业伦理学、农业文化遗产和生态文明的真知灼见,提出不少促进中国农业可持续、负责任发展的建设性意见。刚才郑总的发言让我突然产生一种想法,中国农业伦理学事业的发展壮大,一方面需要多学科的理论建构活动,另一方还需要诸多研究者向农业生产实践者学习,与农业生产实践者保持密切的互动,从农业生产实践(包括历史上的农业生产实践)的需要出发去发现问题和进行理论探索。学习和理解农业,在此基础上反思和规范农业,中国农业伦理学才可能真正接地气,发挥其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规范和引领作用,才可能在世界农业伦理学论坛上赢得更多的敬重和掌声。